

智论

驯服“灰犀牛”当从正视风险开始

刘亮 杨亚琴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闭幕后,《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提出“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之后,中财办在介绍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时强调,妥善解决。由此,“灰犀牛”概念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那么,“灰犀牛”究竟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正确识别、及时采取措施防范“灰犀牛”呢?

“灰犀牛”的三个标志性特征

如果说“黑天鹅”是指那些极其罕见的、难以预测却可能会对市场或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小概率风险事件,那么“灰犀牛”则是指那些发生概率极高、事发前有迹可循且影响巨大的潜在风险事件。在经济学家们的“动物世界”里,“明星”黑天鹅与“新星”灰犀牛是有关联的:“众多黑天鹅事件背后,是不断汇聚的高概率的灰犀牛式危机。”

美国学者米歇尔·沃克在《灰犀牛:如何应对大危机》一书中,提出了“灰犀牛”的三个标志性特征:首先,引发危机的概率非常高,且危机爆发前都有明显的信号或前奏。其次,应对者对风险问题的严重性识别不足或选择性忽视。第三,灰犀牛很有可能导致爆发性的致命攻击,引发灾难性的结果。

从现有的经验来看,“灰犀牛”往往

先兆明显。但事实上,人们却“熟视无睹”“视而不见”,错失最好的控制和处理风险的时机。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呢?

一是“灰犀牛”自身的复杂性和迷惑性。“高概率不等于百分之百的确定性”,识别“灰犀牛”风险具有一定难度。表面上看,一头温顺的“灰犀牛”并不具有现实危险,只有专业的“驯兽师”才知道这头“牛”的喜怒哀乐,普通人并不知道何时会惹怒它,因此,他们往往想当然地搁置“防御计划”。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华尔街几乎所有投资人都意识到美国债券市场价格虚高,且价格迟早会降下来,但由于市场下跌时间及下跌方式很难准确预测,大多数投资人仍相信市场上涨趋势,市场泡沫因此越来越大,直至崩盘。

二是思维惯性导致对“灰犀牛”风险的忽视。人们因思维惯性往往更关注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选择性地忽视对自己有害的一面。如掀起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冰岛,在危机爆发以前,长期以来外国人存款源源不断地涌入冰岛,带来了市场繁荣、投资利率高的“假象”,而事实上冰岛三大银行里的钱已达到了其整个国民经济总额的11倍,美元流通量已远远大于本国货币流通量,这意味着冰岛市场崩盘迫在眉睫。但许多人只沉溺于自己的高收益,而不关注日益迫近的风险。这样一头“灰犀牛”一旦启动,直接导致冰岛国家主权信用一落千丈,并连锁引



发整个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

三是缺乏应对“灰犀牛”风险的积极态度。应对“灰犀牛”风险的最佳策略就是预测其爆发路径并及时做出应对。但是,基于人类拖延的惰性以及这种惰性产生的种种原因,如原有的体制设置无

法应对突发情况发生,如人力财力不足、决策程序复杂等等,造成应对者得过且过逃避责任的惰性。正如著名管理学家海菲茨所说:“改变现状会激发矛盾,让隐藏的内在冲突浮出表面,挑战传统的文化氛围。”这就导致了“灰犀牛”危机爆

发时仍得得过且过,以至酿成更大灾难。

知危图安,“灰犀牛”潜在风险可以预测

与“黑天鹅”的“任性”不同,“灰犀牛”的潜在风险是可以预测的。从金融风险防范的角度来看,防患于未然的关键举措在于:

——防微杜渐,做到“四早”。防范此类风险需要“早发现、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早发现”就是要通过运用当前大数据带来的各类新技术和新手段,及时准确地发现问题,摸清情况。“早识别”就是要精确评估和准确分析出“灰犀牛”问题的程度级别,深入了解其危害性。“早预警”就是要在发现灰犀牛式危机后,提醒其他人防范危机和制订解决方案,以及把计划转化成行动等。“早处置”就是在“灰犀牛”危机爆发时,要做好危机排序,明确工作重点,形成有效应对措施,及时将风险损失降到最低。

——守土有责,做到“四明”。一是明确监管主体责任范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前提就是要明确监管主体责任范围,遵循“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将责任落到实处。二是明确监管对象身份特征,要针对当前技术创新带来的金融创新业务,转变原有机

构监管的思路,按照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理念,开展相关的监管服务。三是明确监管的内容实质,要紧紧围绕金融稳定的目标开展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四是明确对违法违规事件的处理手段,进一步明确金融立法,做到依法规范、依法追责和依法维稳。

——回归金融本源,服务四类经济。金融的实质是使金融的活水更好地浇灌实体经济。防止脱实向虚,金融需要回归本源,首先要回归实体经济和实业的本源,加大对创新型经济、民生经济、绿色经济和城市功能提升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拓宽实体经济融资渠道,降低企业杠杆率。其次要回归信用的本源,实现金融以信用为基础和支撑的本质,营造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

——主动作为,做好“两个对接”。实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无缝对接、监管部门之间的联动对接。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并通过央地之间的互动形成监管合力。各监管部门之间也应该树立责任感和危机感,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的目标出发,主动跨前一步,形成业务和监管对接,从而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地带。

——加强信息互动,做到“三通”。避免各自为战,必须做到跨部门、跨时间、跨空间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包括部门和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不同时期金融数据的对接和跨地区的信息互通,从而有效防止金融市场中的监管套利和监管真空现象发生。

实际上,风险与金融与生俱来。我们能做的是,居安思危,知危图安,不要让金融风险变成金融危机。认识到“灰犀牛”的存在,可以增强忧患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米歇尔·沃克说,或许,我们可以和可恶的“灰犀牛”做朋友。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智辨

是“岗位杀手”更是“就业助手”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

王迎春 李辉



未来,“人机协同”将成为主流工作模式。

资料照片

日前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但是,很多人也担心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就业岗位减少等负面影响。为此,全面辩证地了解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稳妥的措施来应对由此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人工智能重塑就业结构,“人机协同”将成为主流工作模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评估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麻省理工学院David Autor教授在上世纪末率先研究信息技术对工作的替代时,把信息技术定义为能够做“流程性”(routines)工作,据此分析所有工作中可被流程化的部分。他的这种新的框架,不同于传统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或者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分类方法,而是建立了新的方法论。2013年,牛津两位学者(Carl BenediktFrey&Michael A. Osborne)认为新出现的人工智能较传统信息技术有了新的特点,不仅可以做流程性的工作,同时也可以做一些非流程性的工作(如无人驾驶,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驾驶”是不可能代码化的),据此提出了新的方法论。OECD专家整合了上述两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固然可以做非流程性的工作,但是任何一种职业都是由不同的“任务”(task)组成的,人工智能只是替代了一个职业中的某一个或几

个任务,所以并不会造成整个职业的消失,因此进一步推进了人工智能取代就业的研究方法论。

麦肯锡则进一步细化了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和职业所包含的内容,建立了更复杂的方法论。麦肯锡认为职业的工作岗位由具体的工作内容组成,人工智能不是直接替代职业岗位,而是替代工作内容,预计全球50%的工作内容可以通过改进现有技术实现智能化。可以高度流程化和数据化的工作会最先被人工智能承担。近中期就业可能出现“两极”化特点。部分中等技能岗位上可以智能化,并且替代成本适宜,这类岗位可能被快速替代,比如金融领域的数据分析等工作。具备大量人工智能无法完成工作内容的高技能岗位和使用人工智能不经济的低技能工作中短期内受影响较小,但是工作模式也会发生变化。

未来“人机协同”将成为主流工作模式。比如,一个接送儿童上学的校车司机,如果无人驾驶技术成熟,他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陪伴孩子。无人驾驶只是增加了他工作的效率但并不会取代他的工作。而且,随着无人驾驶的兴起,也会增加后台操作人员、实时监督和运维等方面的新工作岗位。因此,人工智能不只是替代部分现有岗位,也会改变工作内容,并可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受技术成熟度、应用经济性、社会接受度等因素影响,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重塑需要一个过程,麦肯锡认为大约要几十年时间。

●要重视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叠加影响

当前,我们分析中国就业结构的变

化,必须要认识到我们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特点。中国具有丰富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差异,拥有得天独厚的战略纵深。从动态演进的视角来看,部分工作岗位被替代并不可怕。通过创新驱动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意味着就业升级,而就业升级必然会让一些“低端”的不安全的就业岗位消失,这是个必须经历的过程。重要的是拥抱变革,拥抱变革带来的变化,并在这个过程中采取积极和有创造性的应对措施。当然部分具体行业可能会受到快速冲击,某些产业结构单一的地区可能出现就业外流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短时间内走了西方发达国家百年发展之路,从制造业来讲,工业1.0、工业2.0、工业3.0都有,从经济整体来讲,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同时演进,并且中国形成了全世界唯一能与美国四敌的互联网产业生态。这些要求我们在面对就业问题时必须综合分析。

最有中国特色的是移动互联网和平台经济对就业的重大影响。滴滴借助于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生态,同时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阿里巴巴对实体店带来极大冲击,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电商就业岗位。近些年由于制造业的自动化升级,就业岗位在减少,但同时新的就业机会出现在新兴的与平台经济相匹配的配送和服务业,部分配送工作源自制造商外包配送服务,承接了很多新的就业。而中国短时间内出现规模巨大的物流工作岗位,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人工智能的深入应用,会进一步改造现有的物流体系,为就业结

构调整注入重大变量,这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从提升我国整体竞争力的角度去研究就业问题

中国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带来的影响,不能把就业问题作为单独的问题来看,应该放到整个创新变革的系统演化进程中去,放到创新全球化的背景中去看。人工智能是金融危机以来关于产业变革演进的大融合,可能形成创新变革的新高峰,这是个客观过程。我们的战略重点应该是抓住这次变革机遇,提升我国整体竞争力。同时在这前提下再去研究就业问题。当前,我们认为应该着手于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现有行业相结合,促进产业升级,保住竞争性就业。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介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上一,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只能进不能退,只能快不能慢。目前,我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正在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我国拥有比东南亚等国家更多的资本和更好的技术储备,要保持竞争力,必须积极采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模式。

二是积极采用人工智能开拓新产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中国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这个消费能力可以为新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中国现在大学生等就业问题,很大原因是高端就业岗位太少,而人工智能创造的新的就业质量优于现在的工作。过去多年中国的技术进步由于拉动投资而净增加了就业,人工智能初始阶段必然伴随大量投资,以及人工智能产品制造也可能会增加相关就业。率先把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新产业、新市场培育起来,就能在这场全球变革中占据主动。

三是从人机竞争共生的视野来设计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技能培训体系。从中长期来看,教育和培训的关键之一是培养人类特有的技能,包括人机协作的技能,这将对我国现有教育体系带来重大挑战。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建适应持续变革和灵活就业的劳动保障体系。要充分重视中等技能人才培养的情况,及时做好引导转岗和社会保障工作,因为这部分人群对技能的培训已经投入了较大成本,对于新岗位期望值高,需要妥善处理。

四是扎实开展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评估的方法论研究。很多智库研究认为中国可被自动化的工作岗位全球最多。当务之急是立足中国实际,设计适合自己的方法论体系,由有关部门牵头采用科学方法全面评估分析智能化对中国就业结构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在评估替代就业方面,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已经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评估方法。但是在分析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就业方面,还缺乏体系化的方法,这方面的评估需要量化的数据模型和定性的未来学方法相结合。(作者单位: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智言

发展社会智库既要扶也要管

刘德海

社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生力军。然而,必须看到,社会智库总体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在我国新型智库体系中发展相对滞后,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健康发展须补好六大“短板”

一是数量不多、布局不均。目前,优秀的社会智库并不多,少数有影响力的社会智库也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二是规模偏小、发育不足。所谓“小机构、大网络”,其实是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研究团队。三是偏离主业、作用不彰。除了少数起点高、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的社会智库外,大部分社会智库都面临生存问题——它们往往会开展大量以创收为目的的咨询服务,久而久之蜕变成“咨询公司”,背离了公共政策研究的“主业”。四是界定模糊、边界不清。当前,一些营利性咨询公司、“民科”“军迷”团体也被贴上智库的标签,有些机构或组织随便搞几场研讨会就自称智库,导致社会智库领域“鱼龙混杂”。五是独立性和自主性不强。社会智库的优势在于其独立的第三方地位。然而,社会智库并非天然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一些社会智库存在拿谁的钱就为谁说话、隶属谁管就为谁出力的现象,有些智库专家被舆论所“绑架”,更有个别专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不稳。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要以今年5月民政部等9部门印发的《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基本遵循,一手抓扶持引导,鼓励社会智库蓬勃发展、快速成长,一手抓规范管理,确保社会智库规范运行、有序发展,推动社会智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以“三个坚持”彰显价值追求

社会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担负着重要职责,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必须做到“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智库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意识,把牢方向导向,自觉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引领自身建设。在发挥理论功能、政策咨询、舆论导向作用时,始终恪守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相统一,秉持思想性与人民性相一致。二是坚持担当社会责任的价值导向。社会智库要坚持把社会责任作为价值追求,依靠自身的灵活性、接“地气”等优势,更好地发挥参政建言、理论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储备、国际交流等重要功能。三是坚持服务党委政府决策的宗旨和主攻方向。只有明确功能定位,突出特色所长,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决策的重大课题开展咨询研究,积极为破解发展难题开出“良方”,为社会有序治理提供“钥匙”,才能体现作为智库的立身之本。

以“三个专业”夯实自身建设

社会智库要行稳致远,必须注重专业化建设,走内涵发展之路。一是打造专业的产品和服务。社会智库只有强化专业特色,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精,与体制内智库竞争时才能获得比较优势。二是建设专业的人才队伍。人才

是智库的核心资源。社会智库可以利用薪酬激励等市场化优势,完善人才分类管理和培养机制,逐步形成专业研究和行政管理两个团队齐头并进的人才格局。三是完善专业的制度体系。要加快构建科学的信息公开制度、规范的理事会制度、稳健的财务运行制度、通畅的沟通协调机制、严格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科学的数据与知识管理体系等专业的制度体系,逐步夯实社会智库的发展基础。

以“三个畅通”优化发展环境

社会智库的健康成长,需要良好的环境、肥沃的土壤。党委政府既是智库产品的主要需求方之一,也是社会智库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是畅通决策咨询供需渠道。当前,党委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措施逐步健全完善,一批涉及实际工作需要的政策性研究、评估、调查等,应面向包括社会智库在内的各类智库。业务主管单位如省级社科联,要发挥桥梁作用,引导和鼓励社会智库接入决策咨询服务体系。二是畅通信息数据共享渠道。推动政府部门的信息、数据在规定的范围内向社会智库公开,以便社会智库能够及时获取。三是畅通资金筹措渠道。资金筹措难是制约社会智库成长壮大、发挥功能作用的重要因素。要优化政府购买智库服务政策,为社会智库的发展提供具有激励导向意义的资金来源。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向社会智库捐款,对社会智库获得公益性捐赠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构建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资金保障体系。

以“三个管理”保障规范运行

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进行严格规范的引导管理,才能避免社会智库行为失范、发展失序。一是贯彻落实好“双重管理”。对社会智库实行民政部门 and 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其中,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由省级社科联作为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门 and 业务主管单位需明确责任分工,强化沟通协调,通过“双重管理”,为社会智库的成长提供完备的制度体系。二是做好“全流程管理”。在入口管理环节,严格做好登记管理工作,对符合标准和条件的社会智库尽快解决其注册问题,赋予其参与智库产品和服务的平等地位。在过程管理环节,贯彻落实好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鼓励支持新闻媒体报道、社会公众进行监督,探索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在退出管理环节,依法查处社会智库违反社会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三是推动社会智库加强“自我管理”。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加强党建管理,在具备条件的社会智库建立党组织,实行党组织负责人与管理层人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强化社会智库的主体责任,让社会智库在“自我管理”的过程中自我提升、自我锤炼,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逐步形成特色、做强品牌。

(作者为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研究员,本文系2016年度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重大招标项目阶段性成果)